

国宝《赵城金藏》

有关史实的考察与辨析

□ 张崇发

《赵城金藏》1949年建国前夕从河北涉县晋察冀根据地运到北平，移交给北平图书馆，现存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这部800多年前产生于山西省，现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赵城金藏》，随着年代的推移，愈来愈显得珍贵。它不仅为佛学、历史学和版本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而且为印刷术和书法提供了珍贵的样板。它的内容十分丰富，连佛教发源地印度已经散失的一些经文，都有包罗。它的版本，仿北宋《开宝藏》的风格；《开宝藏》已失散，它就是至今一切“大藏经”的祖本，素有“在大藏经雕版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之称。多年来，这部稀世之珍一直受到世界佛教界、知识界的高度瞩目。

但是，对于这样一部罕见的国宝的产生、雕印、保护史，除1934年有人作过一些研究外，1981年之前，再无人进行过系统的调查、考究，致使建国后的许多报道、文章，出现了史实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以讹传讹，持续不断。

有感于此，笔者从1982年年初开始了对《赵城金藏》的研究，特别认真的对抗战中八路军保护《赵城金藏》的经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亲自访问了大量主要当事人和重要知情人，分别写了《国宝〈赵城金藏〉始末记》《国宝〈赵城金藏〉抢运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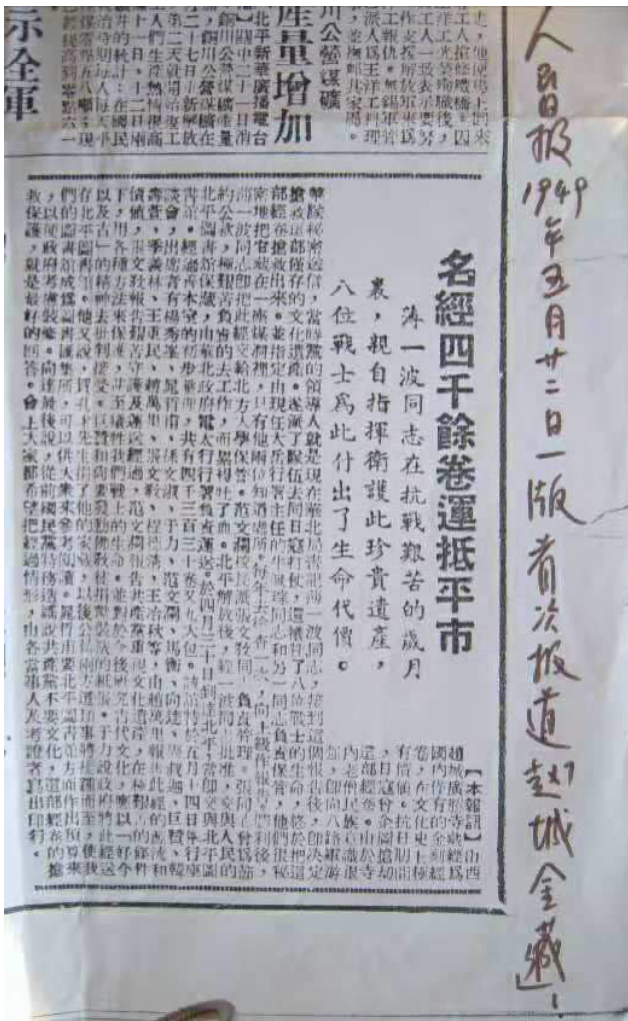
《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稀世国宝脱险记》《薄一波与赵城金藏》等多篇文章，先后发表于1982年、1983年、1984年、1987年、2002年、2007年、2009年的《文物天地》《北京晚报》《并州文化》《中国报道》（英文版）《人民中国》（日文版）《党史文汇》《党史博采》杂志和《中国文物报》上。

2009年4月3日，中国的文物权威媒体《中国文物报》三版，用整整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何季民先生的长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件文保大事》。该文第二段又写了《赵城金藏》的抢运、保管、进京、修复等问题。遗憾的是，该文的作者再一次大量引用陈旧的、未经核实的、产生于60年前（1949）的不实新闻报道材料，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了以讹传讹。

为了纠正错误，消除影响，永远杜绝以讹传讹，笔者将拙作《〈赵城金藏〉有关史实的考察与辨析》重新整理发表。

一、建国之后，报刊书籍对《赵城金藏》的宣传，有的作了艺术夸张描写，有的掺杂了不准确的史料，多数以讹传讹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首先把建国前后30多年间，部分报纸、杂志、书籍中，有关《赵城金藏》的宣传、报导失实的部分，摘引如下：



①194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首次报导《赵城金藏》,记者在题为《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平市》的新闻消息中,说抗日战争中,日寇“企图抢劫这部经卷。由于寺内(洪洞广胜寺)老僧民族意识很强,即向八路军游击队秘密送信,当时党的领导人就是现在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同志,接到这个报告,即决定抢救这部仅存的文化遗产。遂派了队伍去同日寇打仗,还牺牲了八位战士的生命,终于把这部经卷抢救出来。”

②1949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消息《〈赵城金藏〉展览》,消息说:“抗日期间,日寇想抢走它,幸赖八路军、游击队把它抢救出来。为抢救这

部经,八路军曾牺牲了几位战士。”

③195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黄苗子先生的文章《一部佛经与八位战士》,文中说:“日本侵略军占据了赵城,他们注意到赵城那座古庙广胜寺,因为庙里有一部著名的佛教大藏经,他们打算把这部经抢走。……事情经过山西省委的决定,当夜就派出了队伍把这部经运走,走到半路遇上了敌人,一场恶战终于完成了保护这部佛经的任务,但是,为此使得八位英勇的游击队战士英勇地牺牲了。”

④1957年12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一书,在“古老的写本和佛经刻本”一节里写道:“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侵占赵城,打算抢走这部藏经。中共山西省委闻讯后立即作出决定,派部队把这部藏经运走,在中途与敌人遭遇,经过一场剧烈的战斗,终于完成护运藏经的任务。但在战斗中有八位战士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⑤1962年出版的《大地新游》一书(作者王冶秋),在《晋南访古记》一文中,作者写道:抗战期间,党决定抢走这批大藏经,“当时太岳军分区负责人是薄一波同志,他接到报告后,立即派队伍去广胜寺抢救,派人去抢,发生了战斗,我们牺牲了几位战士抢出这批藏经。”

⑥1962年《人民画报》第八期报道《抢救藏经的故事》(孙毅夫撰文并摄影)写道:“4月27日晚上,八路军战士和广胜寺僧人一齐动手,搬运藏经。八路军带来的九十担篮子不够用,广胜寺又拿出九丈九尺土布,才把藏经全部包装运走。第二天早晨,日军得悉,立即派兵追劫,双方在安泽和沁源山里,展开了激战。八路军有八名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⑦1964年《现代佛学》杂志第六期文章《中国佛教史话》第三章写道:“谈起《赵城金藏》有一段惊险

的历史。在抗日期间,侵占山西的日寇想抢走这部藏经,我八路军得悉消息后,……立即组织战士搬运,途中曾和敌人遭遇,发生了一场激烈战斗,结果牺牲了八个英勇的战士才保全了它。”

⑧1981年6月19日《北京晚报》专访文章《古书大夫》(作者林为民)写道:“八路军当即派部队伏击了来抢经书的日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有八名八路军战士献出了生命。”

⑨1981年《新观察》杂志18期文章《八百年经卷复原记》(作者林为民),在“战士的鲜血染红了经书”的小标题下,作者以一整段篇幅写道:日寇企图抢经的“消息传到广胜寺的力空和尚耳中,他冒着生命危险,连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一口气跑到沁源县井峪村,向八路军太岳军区指挥机关求援。陈赓将军闻讯后,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八路军抢经护宝。早春严寒挡不住战士的脚步,在朦胧的月色中,他们赶在日军前面来到广胜寺。在爱国僧人的协助下,迅速从琉璃塔中取出经书,肩挑驴驮,向解放区转移。就在这时,驻守在霍山脚下的日本鬼子倾巢而出,想从八路军手中劫下40多个大木箱里的经卷。顿时枪声大作,敌人蜂拥而上,一部分八路军战士保护着运经队伍转移,另一部分战士顽强地进行阻击。在激烈的战斗中,有八名八路军战士英勇无畏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还对《赵城金藏》的产生,作过这样的叙述:“唐代玄奘化了十六年的时间,从西域十六国搜集来六百多部梵文经书,回国后又用十九年时间把它们译成汉文,大部分收集在《大藏经》里”。

⑩1982年3月24日,《北京晚报》专访文章《了解祖国文化遗产》(作者毕琦),再一次写道:“部队在

抢运藏经过程中,和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为了保护这些祖国文化遗产,我们牺牲了八名战士。”

(11)1982年11月21日,《解放军报》回忆录文章,《抢救珍贵文物<《赵城金藏》>》(署名薛国范,杜天杰整理)一开篇就说:《赵城金藏》“是唐代法师玄奘从天竺取回的梵文经卷的汉文善本”。在写《赵城金藏》的抢运经过时,文章说:

——1942年5月,“军区领导同志接到中央指示后,即指派二分区政治部主任张铁恒赶往赵城。张主任向县委领导传达中央指示后,立即着手组织力量,制定行动方案,并派出侦察员对广胜寺周围的敌情和地形进行侦察。”

——“我们排是县大队(赵城)仅有的武装力量,加上张主任带来的两个排和县公安队,这就是参加抢救行动的全部兵力”。

——“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取走重达二万余斤的七千多卷经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张主任的主持下,方案经过了反复推敲。……带队的张主任把干部召集在一起,拿出他那张按敌情、地形勾画的草图,给各单位分工。他指着图上的道教村炮楼说:‘……’。”

——“夜里八点多钟,……教导员和公安局长刘谦带领进寺人员做僧徒的工作,了解藏经地点。因张主任和寺院方丈李坤是同学故交,就由他找李坤洽谈。旧友相见,叙一些家常之后,一个小和尚把我们来取经的消息悄悄告诉了李坤。顿时,李坤平静的神态变得严肃起来,冲着张主任就问:‘……’张主任面对着这位不开窍的旧友,直是心急如火,他紧锁双眉,不断地来回踱步。”

(12)2009年4月3日《中国文物报》专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件文保大事》,大段大段的引用了1949

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记“赵城金藏”的归来》一文：

——“中途与日寇遭遇，我游击队战士曾为此牺牲了八位，当时拟将藏经送至延安，以道路多阻作罢，就地藏于太行山中，交托给现任太岳行署主任牛佩宗先生和一位刘先生保管。”

——“胜利后决定将此经送邢台北方大学，适北大因平汉线军事紧张，经邢台迁潞城，经刚刚运到河南店，就未再往山下运，就地保存起来，由北大派张文澜先生看管，后来张先生病倒了，乃交太行行署保管，以至于今。”

——张文澜“购买棉花纸张，包扎藏经”。

上面摘引的仅是部分报纸、杂志和书籍中与《赵城金藏》有关的文字片断，这些摘引的片断，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与历史本来面目不符的成份。它们的发表，虽然起到了宣传《赵城金藏》的作用，但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内，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后果。

二、历史资料和多数当事人的回忆证明，《赵城金藏》不是玄奘一人的翻译成果；抗日战争中的抢运行动，我军未与日军打仗，我方无一伤亡

经过3年多的调查研究，笔者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表明，本文前面摘引的文章、报道，确实值得推敲。

1、先说《赵城金藏》的产生和发现。据史料记载，这部经卷并非“是唐代法师玄奘从天竺取回的梵文经卷的汉文善本”，而是汉以后、宋以前各朝各代的著名高僧，及当时来华传教讲学的天竺、安息等国的佛学翻译家和高僧们，不辞辛苦，一字一句从梵文译为汉文，尔后编纂成书的。从现存的四千八百多卷经

文看，参加翻译、编纂的中外高僧多达200余人，其中，最有名的译师是安世高、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人。《赵城金藏》中的《大集经》内就有安世高的译著。这个安世高是安息国（今伊朗高原东北）的佛教学者。中国佛教刚刚兴起之时（后汉），他便来华译经。《中国佛学》一书称：“后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可见他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十分大的。他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到汉灵帝建宁四年（171）的20余年间，先后译出《安般守意经》、《大十二门经》等多部经书。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生前共为我国译出三十九部经。他译经笔调质朴，直而不野，“音近雅质，敦兮若朴，或变为文，或因质而不饰”。（注1）

备受当时佛教学者的推崇，鸠摩罗什的译作，在《赵城金藏》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大智论（100卷）》了。罗什是我国东晋时代的佛教学者。东晋佛教极盛，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2人，其一就是罗什。罗什原籍天竺，生于龟兹国（今新疆库车），精通印度佛教。后秦弘始三年（401）12月20日，后秦皇帝姚兴闻其名，派人将罗什迎请到长安，“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晤言相对”。（注2）并请他住到西明阁和逍遥园译经。罗什受到如此优待，便率领八百余弟子发奋翻译。有时，罗什还与姚兴皇帝共同探讨，“什持梵文，兴执旧经，以相讎校”。由于罗什的译文流便、圆通，八百僧众及姚兴“众心惬伏，莫不欣赞”。（注3）罗什于弘始十五年（413）在逍遥园逝世，时年70岁。一生译经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他的名字和译作，在《赵城金藏》中时有所见。因此，《中国佛教》一书高度赞扬罗什的功绩，说他“是一位对中国佛教起过重大影响的杰出学者和翻译家。”

玄奘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他的译作在《赵城金藏》中占了相当大一部分(但却不是全部)。除了译经外，《赵城金藏》中还收录了他的名著《西域记》三十七卷。玄奘的功绩大于安世高、罗什等人的地方，在于他所翻译的经卷，都是他自己跋山涉水从西域十六国亲自取回的。玄奘译经 19 年，译出经书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数量空前，质量超群。李唐一代，总计译师 26 人，共译经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玄奘所译卷数占总数一半以上。

义净在玄奘之后，也是唐代著名佛学翻译家。早在少年时代，义净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注 4)37 岁时开始游历，一个人“奋力孤行，备历艰险，……诸有圣迹必得追寻。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注 5)从公元 700 年开始，义净翻译自己取回的梵文经卷，主攻律典，至公元 711 年，共译出律典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唐先天二年(713)逝世，终年 79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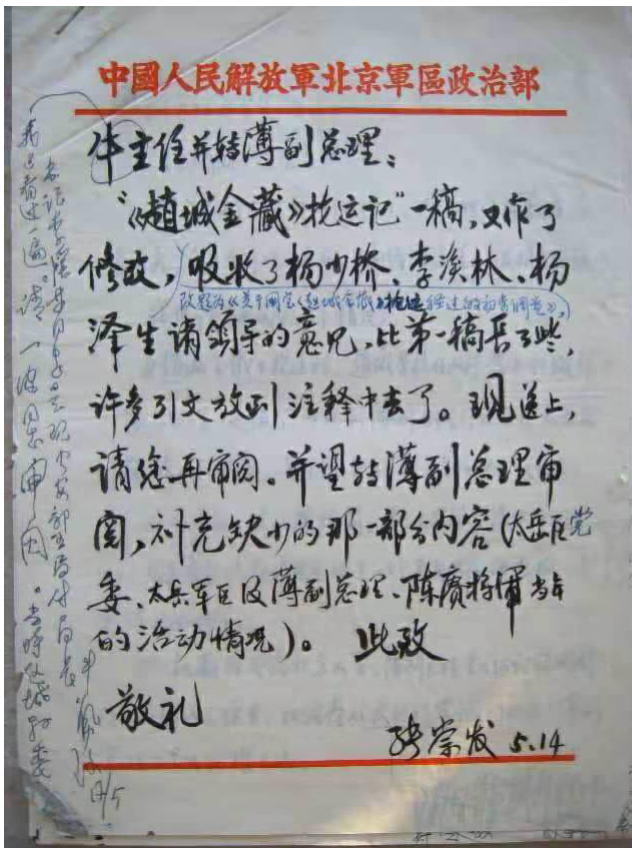
这些佛教翻译家们译出的佛典，从隋朝开始由零散编为整体，称为“一切经”，意思是汇集了佛教的一切经典。也称“大藏经”。唐朝在隋朝编的“大藏经”基础上，又编了许多种，其中以开元十八年(730)编的《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它的入藏目录共收 1076 部、5048 卷，当时全是手抄本。到了北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971)，随着木板雕刻技术的发展，这种手抄本的“大藏经”第一次被雕印，所刻数量达到六百五十二帙、六千六百二十余卷。这个印本被后人称为《开宝藏》，可惜今已散失，仅存几十卷。大约在《开宝藏》刻成之后二年，即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也就是金皇统九年，北方的金朝曾仿照《开宝藏》的风格，重新雕印了《大藏经》，并增添了一些重要著述，

共六百八十二帙，约七千卷。这次雕印的发起人是潞州(今山西长治)女子崔法珍，她斩断自己一只胳膊，以此为号召，倡导晋南数十县的百姓募捐筹资刻经，前后达 30 年。完刻后，金大定十八年(1178)，正式受戒出家，二十三年又被皇帝御赐为“紫衣宏教大师”。在崔法珍倡导下雕刻的这部金代《大藏经》，后来由解州天宁寺藏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于是便有了《赵城金藏》这个名字。

这《大藏经》藏于广胜寺后，至 1933 年前，七百多年内，很少为外人所知。1933 年春天，上海有一个名叫范成的和尚，“在西安见一老头陀，从山西五台山朝拜文殊师利菩萨而来，彼向范成说：‘晋南赵城县太行山广胜寺，有四大橱古版藏经，卷轴式装订。’范成闻此消息，欢喜无量，立时登程前往。一到寺中，见果然不爽。”(注 6)

这个范成如获至宝，便在广胜寺住了两个多月，翻检所存藏经，发现这部藏经中“为各藏所无之经典，竟有四十六种二百四十九卷之多。”(注 7)看来实在是太宝贵、太难得了。于是，范成便打电报给上海影印宋版碛砂经会及北京三时学会(一个佛学团体)，请他们来人研究影印此藏。一年后，终于影印了其中一小部分经文，装订成书，书名《宋藏遗珍》。之后，范成和尚写了《历代雕印大藏经略史》，首次为珍藏于广胜寺的《大藏经》定名《赵城金藏》。从此，这部国宝便开始传之于中华大地。

《赵城金藏》的发现，在当时堪称一大新闻。第二年(1934)南京支那内学院为研究罕见的大藏经，派蒋唯心先生专程赴广胜寺校检。蒋氏日夜翻检数千卷经文，连续工作 40 天，最后写了一篇《金藏雕印始末考》，1934 年底发表于南京《国风》杂志第五卷十二号；1935 年 1 月，由南京支那内学院印了单行本。



牛佩宗转作者给薄一波副总理的信

1934年之后，国内再无人系统研究过《赵城金藏》；对于1934年至今66年间《赵城金藏》的珍藏、保护、修复史，也无人撰写。

纵观以上叙述，可以明确看出，《赵城金藏》是汉以后、宋以前历代中外佛学翻译家共同劳动的成果。到了金代重新雕印，又凝聚了晋南百姓无数钱财和心血。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

2、再谈《赵城金藏》在抗日战争中与八路军、游击队有关的一段历史，即建国前后，特别是1981、1982两年不断报道的《赵城金藏》抢运史。这段历史，发生于1942年。1981—1983年笔者调查时，许多当事人仍然健在，有的同志当时记忆犹新，按说不难搞

清楚。但是，许多文章、报道却其说不一，使不明真相的人很难弄清谁是谁非，哪真哪假。

据笔者亲自找各当事人调查、核实，所有当事人一致指出：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游击队和赵城县人民群众，为保护国家重要文物《赵城金藏》，曾与国民党反动派、闫锡山及侵华日军展开过一场严重的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其中有军民夜奔广胜寺抢运经卷之举，但抢运时，我方与日军并未打仗，我八路军战士更无伤亡。

这次抢运《赵城金藏》的基本经过是：

1942年初春，驻扎在离广胜寺仅四华里的道觉村据点的日寇，一天突然告诉广胜寺住持和尚力空，说他们要在阴历三月十八日庙会时登飞虹塔游览。《赵城金藏》当时密藏于飞虹塔中，日寇“登塔游览”是抢经的一个借口。这消息使力空和尚“坐卧为安，考虑如何才能使这部宝贵藏经不落于敌人之手而保留在祖国的土地上。经过几日几夜的审虑，想到只有八路军。於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跑下山往井子峪找到八路军负责人之一当时任赵城县县长的杨泽生同志。”（注8）

与此同时，我八路军敌工人员也从敌人内部获得情报，得知日寇将在近日内抢夺《赵城金藏》。（注9）

赵城县委将情报立即传给太岳二地委。地委书记兼二分区政委史健，得到报告十分敏感，认为事关重大，便迅速向太岳军区及太岳区党委作了报告。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接到太岳区的报告，电令八路军太岳军区所属部队全力保护《赵城金藏》，决不能让日寇抢走。（注10）

党中央一声令下，太岳区各级都紧急行动起来。

太岳二地委书记史健，立即将延安的电报转给赵城县委书记吴辰。赵城县委迅速进行了研究。经过

几次与老和尚力空协商,确定:我方一定要赶在敌人之前,抢先把经卷搬运出来。当时,力空出于对经卷的爱护,向抗日政府提出三个条件:①每卷经都要用布袋子装好;②搬运时要装在箱子里;③争取送到延安去(怕日寇经常扫荡根据地,容易使经卷丢失)。抗日政府接受了力空的条件(实际抢运时,因时间紧迫,来不及,未用布包,未装箱),并给力空打了个“借条”,其目的在于保护力空,让力空利用此“借条”去应付日寇。(注11)

抢运的行动方案是:请太岳二分区派一个连武装掩护,县、区游击队及公安队配合行动。县委机关干部、党员参加转运经卷;组织一支由民工组成的牲口驮运队,每个牲口备驮筐一架。为了防止泄密,只通知民工说是“运公粮”。

太岳二地委书记兼二分区政委史健,同时给二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及参谋长蔡发祥下达指示,要他们派部队奔赴赵城县广胜寺,抢运《赵城金藏》。当时二分区所属部队经过整编,号称是一个基干营,实际只有一个连。营教导员刘忠(建国后名刘一新)领受任务后,为了隐蔽行动企图,防止走漏消息,只给副营长罗志友作了布置,要他带领一连两个排前往广胜寺(注12)。一连指导员王万荣、排长张义龙和张龙祥,在部队出发时,谁也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注13)

农历三月十三日,太岳二分区基干营一连两个排的80多名战士,在罗志友和王万荣的带领下,从安泽县热留村营部驻地出发了。一路上,战士们都像猜谜语一样,猜测着这次秘密行动“究竟是干什么?”

部队急行军赶到赵城县兴旺峪(县委所在地)后,秘密才公开了。这时,副营长告诉大家:“我们的任务是把广胜寺的经卷全部运走。要尽量隐蔽我军

行动企图,避免与日寇交火,以保证经卷不受损失。”等到天黑之后,利用夜幕的掩护,部队从兴旺峪直奔广胜寺而去,半夜时分到达。(注14)

这时,广胜寺周围及附近道觉村、明姜村等几个敌伪据点,已经布置了县、区游击队。一连两个排到达后,一个排进入广胜寺,和县、区机关干部共同搬运经卷,一个排与县大队一个连及区分队,分布在广胜寺山下,摆出佯攻道觉村据点的态势,包围道觉村之敌,防止敌人出动。县大队另两个连分布于广胜寺山边沿,掩护搬运经卷的同志。(注15)

县大队队长许生芳是赵城县有名的抗日英雄,当时负责指挥县、区游击队。县长杨泽生当夜坐阵于离广胜寺八华里的郭家节村。这里事先集中了骡马驮子。杨泽生同志主要负责组织县、区干部(约五六十人)将从广胜寺背出的经卷,装到牲口驮筐中,然后向山后转移。

广胜寺内,基干营一连的战士们摸黑进入飞虹塔中。当时,《赵城金藏》藏的十分隐蔽,藏在飞虹塔第二层内一个淡黄色舍利小塔中。1933年范成和尚曾目睹此塔,著文说:此小塔高约八尺,中藏舍利子。(注16)这是力空和尚的又一功劳。1937年“七·七事变”后,力空害怕日寇的战火毁掉经卷,便将经卷从广胜寺藏经殿内“吊送到舍利塔上封藏起来”(注17)。这次抢运,战士们在飞虹塔内用绳子先把经卷捆成捆,然后从塔内的通道上,一捆一捆往下放。由于通道狭窄,速度十分缓慢。为了争取时间,有些性急的战士,干脆把经捆从二层塔门搬出来,再从二层塔檐上扔下去。地面上的人员用双手去接。塔檐为琉璃瓦,十分光滑,站在上面随时都有滑下来的危险。此时此刻,勇敢的战士们一心想的是抢运国宝,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注18)

这样,军民联合,共同行动,拂晓前就把飞虹塔内的藏经搬了出来。

怎么运往后方根据地呢?主要是靠民工们的骡、马驮筐,大约有三四十头牲口。另外一连两个排的战士也参加了运送。两个排 80 多人,每个人都解下自己的裹腿带子,一根带子捆一捆,能挑的就挑;挑不动的就背着走。一排长张义龙、二排长张龙祥身先士卒,不时帮助体弱的战士背经捆。罗副营长和王指导员边走边鼓动战士们“加油!”因此,行军速度很快。虽然春寒料峭,但每个人都是汗津津的。第二天中午,运经的队伍便顺利通过敌占区,回到了安泽县热留村(注 19)。帮助骡马驮子卸下经卷后,一连参加抢运行动的两个排进行了汇报、总结。教导员刘忠参加了总结会,并讲了话,表扬战士们干得好。不久,基干营派一个班押运,将经卷转运到太岳二地委和二专署的驻地安泽县亢驿镇,然后又由亢驿运到太岳军区及太岳区党委所在地沁源县。从亢驿往沁源运送时,全是毛驴驮子。(注 20)

在这次抢运过程中,赵城县、区游击队在县委的组织下配合得极好,他们埋伏在敌人据点附近的麦地里,潜藏在八路军通过的道路两侧,警惕地保卫着战士和经卷的安全。早上八点左右,当一连指战员撤离广胜寺、离开平原地区,爬上山头时,敌人据点里传来零星的枪声。为了把经卷完好无损地运回解放区,战士们和游击队听到枪声后,没有还击。(注 21)

八路军和游击队把《赵城金藏》从广胜寺中抢运出去后,不久,日寇即找力空和尚报复。据力空回忆:当时,“占驻晋南日军司令大发雷霆,亲带军队来山声色俱厉地责问,竟要杀我焚寺以泄愤。我已抱着为法忘躯的决心,不为他的威力所屈。”(注 22)后来,日军司令的侍从武官,一个姓陈的临汾人,从中代为劝



1982年5月15日,牛佩琮、杨少桥、李溪林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参观1949年《赵城金藏》展览说明。

释,这才使力空免于—死,寺院免于—焚(注 23)。

以上情况说明:《新观察》《解放军报》等报纸杂志上所写的“驻守在霍山脚下的日本鬼子倾巢而出”,“顿时枪声大作,敌人蜂拥而上”,“一部分战士顽强地进行阻击。”“清晨四点多钟,日军和伪军一个多连的兵力,从明姜镇据点匆匆赶到井子峪和郭家节搜查。”战士们“集中火力兜尾打了一阵机枪。敌人拖着死伤人员狼狈逃回了据点。”等等,都是不存在的。

笔者在调查中,特别注意让当事人回忆“打仗”、“牺牲了八名战士”两个重要情节,回答都是否定的。除了上文中引用的一些当事人谈话可以证明外,当年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赵城县县大队政委李溪林、

二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基干营一连一排长张义龙,及原赵城县委组织部长张耀、公安局长刘千等同志的谈话和回忆材料更能说明问题。牛佩琮说:“看了报纸上的报道,我觉得不对。我记得当时并没有打仗,也没有牺牲我们的同志。不过,我怕记错了,就打电话问商业部副部长杨少桥同志,他当过赵城县县长。结果,少桥同志也说,报上的文章写错了。”张天珩同志说:“我们基干营一连从出发到归来,从未与日军交火。战士们和民工悄悄就把经卷运回来了。”刘一新同志说:“在广胜寺往根据地运经途中,没有与敌人遭遇。”李溪林同志说:“抢运经卷靠的是智取,而不是武夺,那是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张义龙同志当时率领一排40多名战士包围道觉村据点,最有发言权,他说:“如果双方一交火,敌强我弱,抢运经卷任务怎么能完成呢?”刘千同志参加了背经,并组织公安队武装掩护运经队伍,目睹了当时的情景。他写材料说:“当时抢运经卷的布置,一切都是围绕着避免碉堡内的敌人发觉,避免发生战斗。……完成了转移抢运任务,道觉(村)碉堡敌人丝毫不知。没放一枪一弹。”

薄一波同志1942年是太岳区党委负责人兼部队政委。《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运出来,送太岳区后,薄一波同志十分关心经卷的保管工作,他让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负责,把保管一事交给绵上县县长,县里组织人员把经卷藏在沁源北部深山中一座煤窑里。

为进一步核实抢运经过,1982年笔者将调查材料初稿曾送薄一波同志审阅,他也认为抢运时死人的事是没有的。只是有一次,薄一波派秘书刘元璋去煤窑检查经卷存放情况时,路遇日寇扫荡,刘秘书光荣牺牲。这是共产党人为保护佛教典籍《赵城金藏》,

献出的唯一一条生命。

3、至于《赵城金藏》的保管问题,真实情况是这样的:1946年,太岳行署发现,由于煤窑条件太差,有些经卷当时已经发霉、糟朽不堪。便决定转移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不久,《赵城金藏》被运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涉县下温村。为了管好这部经,组织上决定选派一名懂历史的干部去负责,委托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挑选。范文澜十分热心此事,便让教导主任尹达派张文澜去了下温村。

1946年秋的一天,从八路军太岳行署的驻地——山西省沁源县,有20多头牲口驮着42个木箱,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太行山东边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涉县前进。来到涉县,押运42个木箱的八路军干部把箱子卸在了下温村一个天主教堂里(此教堂还在)。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派人前来接收,打了收条后,押运的八路军干部又赶着牲口返回太岳行署。

范文澜先生听说从太岳行署运来的东西已经到了下温村,非常高兴,立即找来那名懂历史、刚从抗日前线调来的八路军干部张文澜。

张文澜听说让他保管的东西是国宝,深感肩上的担子重。从那天开始,他决定把42个木箱,一箱一箱地打开,把里面的经卷一卷一卷都取出来。谁知,刚打开第一箱,他就惊呆了:里面经卷潮湿发霉,不少已严重损坏。他又心疼又发愁,心想:当务之急,必须把潮湿的经卷弄开、晾干。可当时已是深秋,气候转冷,靠凉风慢慢阴干,速度太慢了,弄不好那些潮的十分厉害的经卷就会烂掉。“用什么办法呢?”张文澜想啊想,想起家乡的火炕。“对,用火炕来烘干!”他高兴地赶紧到几十里外去挑干柴。挑回干柴,他细一想,又觉得不妥:干柴烧炕火太硬,有可能把经卷烤



1982年5月15日,在抗日战争中保护过《赵城金藏》的部分有功人员——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时任国务院财贸小组负责人)、赵城县县长杨少桥(时任商业部副部长)、赵城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李溪林(时任公安部九局局长),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在中国图书馆善本参观《赵城金藏》。善本部负责人薛殿奎向参观者介绍情况。

焦。“对,用锯末烧炕,炕是温乎的,效果肯定好。”张文教便四处寻找锯末。不久,42个木箱中装的4800余卷经卷,经张文澜烘烤全部变干了。张文澜是个细心人,他先买了一些纸,后又找了不少旧报纸,把这4800多卷经书一卷一卷包起来。

当时,只有《新华日报》社有多余的旧报纸。经联系,张文澜每天去报社挑一担旧报。一天傍晚,张文澜挑着担子经过漳河河滩时,遇到一群恶狼,狼群围着他边走边嚎叫,非常危险。张文澜故意哼着小曲大模大样地往前走,终于过了漳河桥。谁知他心里刚有点

踏实,前面又来了一群狼。恶狼的眼睛在夜幕中闪着绿光,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恰巧他没带枪,也没有其他防身的东西,张文澜只好用老办法同狼群周旋;狼尾随着他,一直跟到下温村村口才散去。精神极度紧张的张文澜,看到村庄后,就挑着担子逃跑。回到驻地,连惊带累,一下子倒在地上,口中直吐鲜血。

为了找到一个最安全最干燥的地方,后来,张文澜把4800余卷经卷,从下温村又搬到常乐村,并选中村里一户地主家的阁楼。阁楼四面通风,经卷放上去从不受潮。张文澜欣慰万分。

一个人保管 4800 余卷经卷,片纸不能丢,一字不能缺,半卷不能潮,张文澜每日都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并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不断采取一个又一个新的保管方法。终于,过度的操劳,严重损害了张文澜同志的身体。不久肺病复发,无法工作,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经卷。病愈后,他被派到解放战争的前线,搞城市接收工作。

1949 年,正在太原搞接收的张文澜,突然接到华北人民政府打来的电报,要他尽快将珍藏在涉县的经卷送到北平。新任务使张文澜和 4800 余卷经卷再次重逢。他在群众的帮助下,先把经卷运到涉县城,然后装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京汉铁路不通车,从邯郸到北京只能雇汽车来运。为了不使经卷丢失,张文澜不顾长途行车的颠簸,白天黑夜都睡在汽车上,4 月 30 日把经卷安全送到北平,交给了北平图书馆。

4、《赵城金藏》的修复问题,情况如下:1949 年 5 月 14 日,北平图书馆对《赵城金藏》组织了一次小型“择优展览”,并召开了座谈会,出席者有杨秀峰、晁哲甫、孙文淑、于力、范文澜、马衡、向达、周淑迦、巨赞、韩寿萱、季羨林、王重民、赵万里、张文澜、程德清、王冶秋等。赵万里报告《赵城金藏》的源流和价值,张文澜报告艰苦守经及运送经过,范文澜报告共产党重视遗产的情况。参加座谈会的领导、专家,对古老文物尤为喜爱;但对那些已经残破而不能拿出来展出的经卷,也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希望能早日得到修复。晁哲甫要北平图书馆作出预算,如何修复《赵城金藏》。

修复这样一部洋洋数千卷的 800 年古物,对于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北平图书馆来说,谈何容易!但北平图书馆的领导,面对困难并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1949 年,他们在工匠缺乏和情况下,先让本馆裱糊组的肖顺华同志负责揭裱。肖顺华是专门从事修

裱善本的,突然让他裱经卷,一无工具,二不顺手,裱了几卷就停下来了。不久,馆里就从琉璃厂请了专门揭裱字画的李世尧师傅。李师傅一个人干了一年多,觉得工程量太大,自己力不从心,辞职走了。1954 年,北京图书馆领导赶紧从北京琉璃厂文艺山房裱店,请了一位具有十五六年艺龄,但年岁却不大的揭裱能手韩魁占,让他承担起《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

韩魁占,这个来自河北深县的青年人,15 岁便在北京著名的裱画店玉池山房学徒。揭裱《赵城金藏》这样浩繁而残旧的经卷,正是显示并进一步提高他的手艺的大好机会。他高高兴兴挑起了这付重担。到了北京图书馆,看到这么多箱经卷,他粗略做了一番估计:数量大暂且不说,残破程度严重,那可是罕见的——有的腐烂成了棉絮状,完全失去了纸型;有的被挤压成棍状,硬梆梆的,极难剥开;有的能勉强解开,但一解开就“冒烟”、掉纸片。这种活,如果仅一人揭裱,天天不休息,早晚都加班,得干七八十年。对于韩魁占来说,这就意味着:直到进棺材也干不完。

当时,韩魁占心想:我能拯救国宝,苦累一辈子,也值!他丝毫没有被困难吓住,一门心思全放到了《赵城金藏》上。他天天伏在裱糊案上,找窍门,创新法,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为了把棍状的经卷剥开,他先把经卷放到笼屉上蒸,使经卷浸上潮气,自然松动;有的见效,有的不见效。后来,他就改用清水浸泡,浸透后再凉成半湿不干的样子,然后一层一层地揭下。对于粘成一团的经卷,他先用小喷壶喷湿,然后用针尖小心地去挑,细致得真像绣花一样。对于这些难度大的经卷,他边揭边裱,一卷花费一个多月时间。如此缓慢速度,常常使他产生急躁情绪。但人民的重托又每每使他心平气和。

不过,他的急躁,是为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急,是

为人民而急。这种急躁,促使领导很快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增人,必须加速!

1956年,明智的北京图书馆领导,又从外面调了3位揭裱师傅:张万元、徐朝彝、张永清。他们都是北京琉璃厂有名的揭裱店的匠人,一位是“二友山房”的,一位是“宛委山房”的,一名是“大树斋”的。从此,韩魁占有了新伙伴,4个人结成一个整体,取长补短,共同研究。他们对每一卷经都编号、写签、登记,然后制定每月计划,开展比学赶帮活动。为国家抢救珍宝的高度责任感,驱使着每个人,使他们日日超定额,月月超计划。这样,《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大大加快了进程。难裱的经卷,逐渐由一个月降到半个月;好裱的一天就是一卷。经过4高师的10年苦战,到了1964年,洋洋4400多卷古经,全部修复完好。

值得记叙的是,在4位高师全力以赴揭裱《赵城金藏》期间,敬爱的陈毅副总理和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郑振铎等同志,曾特意来到北京图书馆揭裱工作间视察、指导。在善本部主任赵万里的陪同下,陈毅副总理关心地询问揭裱组长肖顺华及韩魁占等人:进度如何?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国家解决?并指示他们:一定要把这部稀世之珍、举国之宝修裱好。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常常成为韩魁占等人的动力。

还应当记述的是,1949年,修裱刚刚开始的时候,全国佛教界知名人士、《现代佛学》杂志的负责人巨赞法师,也为《赵城金藏》出过力。当时,北京图书馆缺乏质量较高的广西绵纸。这种纸颜色发黄,与《赵城金藏》的颜色一致,而且拉力、韧劲都很大,没有它,《赵城金藏》几乎就无法揭裱。巨赞法师在参加5月14日的《赵城金藏》座谈会上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八路军、游击队能舍生忘死抢运佛经,自己是佛教界人士,更应倾全力援助。便当即向参加会议的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同志表示:“裱《赵城金藏》

的广西绵纸由我筹办!”事后,巨赞便找到李济深先生研究此事。李济深是广西人,又是佛教徒,非常愿意从中出力。他们便给广西、广东佛教界写信,请佛教徒募捐,然后用募捐的钱,在广西买了数万张绵纸,直接寄给了北京图书馆。1982年4月24日,笔者访问巨赞法师时,巨赞谦逊地说:“多亏李济深先生了!我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浸透着许多人心血的《赵城金藏》在大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中,命运如何呢?

笔者调查的情况是:虽然那时候全国各地都在发生着砸图书馆、烧旧书的可怕现象,但北京图书馆,特别是珍藏各种善本书的北图善本部,却没有遭到内部或外部的任何侵扰,各种书籍,尤其是《赵城金藏》,均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书库里,至今仍不断接待着中外收藏家、版本学家及考古专家们的瞻阅。

《赵城金藏》及其他许多善本书能够有这样的命运,与北京图书馆近千名职工的高度觉悟及善本部诸同志的精心管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据调查,“文化大革命”初期,馆里的几派群众组织,虽然打派仗,但对“四旧”色彩浓烈的善本书,没有一个人提出过一个“烧”字。他们深知:这些千百年前的古物,已经少得可怜了;那里面虽然记录了一些鬼、怪、神、佛,但也记录了大量天文、历史、算术、哲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毁了它们,就等于毁了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京图书馆的近千名职工,除了善本部本部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轻易都不走近善本部。有些人的亲朋好友,有时怀着好奇心要求带他们去善本部看看,得到的回答总是:不行!

在那样的年月里,善本部为了防患于未然,采取了许多特别保护措施。他们针对社会上“冲击机关”的现象,要求馆里实行早关门。晚开门;晚上,只要大

门紧闭之后,非本馆人员,一律不再开门。同时,在善本库,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个个认真坚持规章制度,而不是要“砸烂旧制度、破除老框框”。从“文化大革命”至今,善本库一直实行着这样的制度:

“非本组工作人员(本部人员酌情),一律不得擅入善本书库。凡因公非入不可者(装订室修补善本书人员、照像室复制善本书人员例外),一律持馆长签署的入库证,方可入库,并且要进行入库登记。”

“库内绝对禁止会客,组内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将至亲、好友、熟人等,违章带入善本库。”

“善本书库,除库房管理人员及规定在库房办公的工作人员,可于班外的中午自行入库外,其余任何人,不得在班外任何时间,擅入善本库。”

“善本书库管理人员,每天下班前,除按规定严格检查门、窗、电等要害部位外,……每天下班时,要在几道关键性的门上,加贴锁封。”

至于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也时时约束着每一个善本部的人员。比如,一些年轻的新同志刚分配到善本部工作,他们听说这里藏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各种宝书,很想进库里看看稀罕。善本部的领导们只集体组织他们参观一次;以后,只要与库里无工作关系,永远不得再进入。善本部来过几次新同志,次次都是这样做。

规定、制度固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关键在于善本部的工作人员个个都很自觉。这里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善本库管理人员,名叫陈恩惠,30多年来,他天天与善本库打交道,有着丰富的版本学实际经验。他管理书库,一丝不苟,尤其对《赵城金藏》更是爱护备至。有一天,他的侄子来书库找他,他没等侄子说明来意,便要求侄子“赶快离开”,并说:“有事回家说,这里不会客!”平时,他总是第一个入库,最后一个出

库;不把各关键性部位检查好,决不随便离开。善本组负责人薛殿玺向笔者介绍情况时,十分钦佩地说:“这位老人从前在一所大学搞法文,1949年来到图书馆后,他就进一步迷上了善本书。法文他甘愿放弃,但让他离开善本部、离开《赵城金藏》,他是坚决不答应的。考虑到他年纪太大,我们请他休息,但他说什么也不干,他说他要为善本书贡献自己的一生!”

1982年,陈老先生年近80岁,每天仍象一尊守卫祖国神圣大门的壮士一样,威严地把守在善本库的门口,不管任何人,只要没有馆长签发的入库证,或者不符合库规,他是决不放行的。

善本部的其他中青年工作人员,也都象陈老先生一样,自觉地、忠于职守地工作着。“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人去干校,部里仅留下少数人顶班。负责《赵城金藏》等珍贵善本的中年干部李致忠(今善本组组长)等人,克服家庭及库里出现的各种困难,把工作做得很细、很好。他们采取措施防虫蚀、防潮湿、防变质、防火灾,使《赵城金藏》等一批国宝,始终保持着一级质量。

正是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这些令人崇敬的工作人员,才使《赵城金藏》在风雷激荡、大破大立的10年间,卷卷无恙,一切完好。所以,1982年3月,日本一位版本学专家阿部隆一来访时,当他说了“文化大革命时,我真替《赵城金藏》的命运担心”这句话后,善本部的同志们便自豪地作了回答:今天您该放心了。

三、建国以后,有关《赵城金藏》的宣传,一再产生失实问题,教训在于缺乏严格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负责精神

对于这样一部举世瞩目的珍贵文物,在长达75

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一篇准确的历史介绍,教训是深刻的。

笔者利用现有资料,对产生失实的原因,进行了初浅分析,感到如下几点恐怕是不容忽视的:

①写作者未作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

笔者在调查中得知,凡是我所找到和见到的与抢运《赵城金藏》有关的当事人,本文前面列举的失实文章的作者都没有找他们调查。这就是说,那些报道和文章的作者,在写作之前的采访与调查是粗略的,他们主要是通过第二者、第三者采访,有的只找了一两个当事人。因而,他们占有的材料是不全面的,有些则是传来传去变了形的。以《抢救珍贵文物〈赵城金藏〉》一文为例,这是一篇回忆录,文章署名者是参加过抢运《赵城金藏》的一位县大队的排长。文中提到许多人名,这些人大都健在,然而却大都写错了名字(将张天珩写成了张铁恒、将力空写成了李坤);特别是把一些根本没有的事,按在了这些健在者的头上。笔者找张天珩、刘一新等同志调查时,他们都否定了《抢救》一文中写到的与自己有关的事实。张天珩说:“军报的文章说我‘赶往赵城’,‘向县委领导传达中央指示’;并有色有声地描写我如何带着部队,给各单位具体分工;甚至写了我与广胜寺方丈李坤(应为力空)是‘同学故交’,我们在广胜寺方丈室有一段‘洽谈’,等等。抢运时,我根本就没有去广胜寺,怎么能有这一系列的活动呢?我与力空不是同学,更谈不上故交。写文章的同志,没有找我了解、核实,不可能不出错。”《抢救》一文说的“刘教导员”,就是1982年在重庆市国防工办工作的刘一新同志,他给笔者来信指出:“去赵城抢运藏经……据我回忆当时因有别的事没有去成”。可见,《抢救》一文的作者也是没有找刘一新同志采访的。

再以“《赵城金藏》是玄奘所著”这一事例来说。《赵城金藏》的产生史,除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书提及外,中国佛教协会的许多著名法师、居士都是熟知的,只要仔细查阅史料,或者登门访问佛学专家,一般是不会出那样的笑话的。估计,一些作者并没有做这项工作,于是错误便出现了。

②转抄有错误的史料,致使以讹传讹。

分析多数失实文章、报道,笔者发现,所谓的“打仗”、“牺牲”之说,都产生于1949年《人民日报》首次宣传《赵城金藏》的那篇报道之后。在那篇报道中,记者写了薄一波同志“遂派了队伍去同日寇打仗,还牺牲了八位战士的生命”。于是,在以后的文章、报道中这种说法就被引用并传播下来。首篇报道失实,原因是:1949年5月22日和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两篇报道时,参加抢运《赵城金藏》的当事人都正在解放战争的前线,记者在见不到当事人的情况下,只能听北京图书馆的同志介绍,这样也就很难保证准确。而以后写文章的人又不作追根究底的考问,互相引用,以讹传讹的现象就出现了。

③当事人的回忆有差错。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当事人都已年过花甲,记忆力减退,加上抢运《赵城金藏》一事发生于40年前(以1982年为界),时间比较久远,因而,对有些情节、细节往往各说一套,“对不上茬”。有的当事人,当年并未处于掌握全面情况的领导地位,只知自己所眼见或亲为的一段,不知面上的情况;然而谈论抢运经过时,他们往往扯的面很广,把事后听到的一些传闻,也当作史实向人介绍。这样,如“实”写来,也是会失实的。《抢救》一文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况。回忆人是当年赵城县大队的排长薛国范,他对于县委、县大队、一连指战员,以及二分区、太岳军区各级领导机

关、领导同志的行动,一般说是了解不多的。然而回忆录却把上上下下各方面的情况都涉及到了。结果,当年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否认这些事情,那么这篇文章的差错,恐怕就不一定全是整理者的责任了。

笔者在《文物天地》杂志 1982 年第四期上,曾发表过《〈赵城金藏〉六次转移记》,文中写到 1942 年曾发生过两次抢运《赵城金藏》的事,第一次的大体经过是:1942 年初春,赵城县委突然接到太岳二地委转来的延安电报,指示赵城县委组织力量抢运经卷。县委书记李溪林立即召集县委主要领导开会,然后与县大队长许生芳亲赴广胜寺察看地形,并组织民工以“运公粮”为名,利用夜暗前来抢运。抢运时,县大队三个连隐蔽于广胜寺至县城一线,防备县城方面日军出动。当时,广胜寺下面的道觉村尚未住上敌人。这次抢运就是要赶在日军进驻道觉村之前。运经人员主要是各村民工 200 多人,一夜之间就将飞虹塔内的部分经卷运到安泽县亢驿镇。

这次运经行动,从情报来源、参加人员、运送方式,都与本文前面写的不尽相同。经笔者找更多的当事人核实,普遍认为抢运只有一次,所谓的第一次,恐怕是回忆者记错了一些情节。究竟重要当事人之一李溪林同志的回忆,准确性如何?笔者目前还没有掌握足够的可以否定他们的回忆的材料,特写在这里,作为存疑。但此例也说明,当事人的回忆是决定史实准确与否的关键。

④用文艺创作的手法撰写历史。

抢运《赵城金藏》的当事人之一、原赵城县县长杨泽生,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曾就某些文章的写法谈过一段看法,他说:“历史与演义不同,写历史只能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北京电影制片厂写过一个以抢经为内容的电影剧本,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

提了些不成熟的看法。那是文学,当然可以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允许)有某些故事虚构。如写历史就只能按历史本来面目写。”

杨泽生同志这段话是针对《新观察》和《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八百年经卷复原记》《血染的经卷》来说的。他认为那两篇文章中写的“日本鬼子倾巢而出”,“顿时枪声大作,敌人蜂拥而上”等,完全是一种艺术加工,不是写真实的历史。军报发表的《抢救》一文,这种情况似乎更严重些。比如,张主任与力空和尚的洽谈,你一言我一语,整整谈了“近三个小时”,这些谈话内容、动作神态,实际上都不存在。因此,这些描写就不能不给人以合理想象、艺术加工之嫌。再如,刘一新教导员把部队集合在山坡上进行动员时的神态,文章是这样写的:“他习惯地扶了一下腰间斜挎着的驳壳枪,严肃地说……”刘一新同志压根就没有带部队去广胜寺,当时在广胜寺的回忆者薛国范自然不可能讲出以上情况,那恐怕就只能由整理者“整理”了。特别是,该文说《赵城金藏》有“二万余斤”,真不知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要知道,1942 年存在飞虹塔中的经卷,早已不是原有的七千余卷了,由于丢失,仅存四千七百多卷。这四千余卷经,不仅抢运人员当时没有来得及清点数目和份量,就是今天,保存经卷的北京图书馆也没有称过它们的份量。看来,用合理想象等手法撰写历史,实在要不得。

这就是笔者对失实史料原因的几点粗浅分析。

笔者认为,鉴于《赵城金藏》的有关史实至今仍有统一不起来,以至存疑的地方,有的历史情节尚待调查,所以,恳请一切撰写与《赵城金藏》有关文章的同志,千万吸取教训,不管写报道、还是写历史,一定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高度的负责精神,尊重事实、深入调查、潜心研究,不能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更不能随心所欲,渲染创作。

由于笔者至今尚未找到另一些当事人,所以笔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调查成果就是最准确的,如果有知情者可以补充、纠正某些史实,笔者表示衷心欢迎。本文不妥之处,望各方人士批评、指正。

附:张崇发给《平阳方志》编辑部的附言

《平阳方志》编辑部:

发去《〈赵城金藏〉有关史实的考察与辨析》一文及相关照片。

此文花费作者大量心血,史料严谨,且经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薄一波副总理等专家和当事人审阅、把关。因此,发表时,最好不要在文字上随意删减。

张崇发 2018.11.18

注释

(1)《道地经序》

(2)《高僧传·鸠摩罗什传》

(3)同上

(4)《高僧传·义净传》

(5)同上

(6)《历代雕印大藏经略史》

(7)同上

(8)《现代佛学》1957年第5期:力空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9)原赵城县委副书记(甘肃省总工会副主席)吴辰同志的谈话记录。

(10)原太岳二地委书记兼二分区政委史健之子李万里,转抄自其父逝世时一些老战友的回忆材料。电报稿待查。

(11)原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公安部某局局长)的谈话记录、原赵城县县长杨泽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党组书记)同志的回忆材料。

(12)原太岳二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经理)同志的谈话记录。

(13)原基干营一连排长(炮兵学院某部团长)张义龙谈话记录。

(14)原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王万荣(成都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同志的谈话记录。

(15)杨泽生同志回忆材料

(16)《赵城金藏》究竟藏于飞虹塔二层还是底层,其说不一。多数人(包括力空和尚)回忆藏于二层。薛国范回忆录说:“藏经地点是古塔下边的密室。室内有一尊三米多高的铜铸坐佛,铜佛内是空的,佛座是用青砖垒起的,没有留门,里边有很大的空间,是藏经的理想地方。”这种说法与“藏于二层内一个小舍利塔中”,有些相近。是否薛国范同志记错了?待查。

(17)同(8)

(18)王万荣谈话记录

(19)刘一新回忆材料

(20)同上

(21)王万荣、张天珩谈话记录。张天珩说:“听部队汇报说,抢运时敌人炮楼打过枪,我们部队没有还击。”

(22)同(8)

(23)同(8)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老新闻工作者”荣誉证书获得者、主任记者、资深旅游文化研究人员)